

# 南宋中后期古文评点产生与流行原因新探

## A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Popularity of “Commentary on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in the Mid to Late Song Dynasty

岑天翔<sup>1</sup>

Tianxiang CEN

日本大阪大学人文学研究科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Osaka University, Japan

ctxzhejiang@foxmail.com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384632>

**摘要** 古文评点是伴随南宋中后期古文选本而发展起来的新产物。关于古文评点产生的原因，学界多从经学章句、读书句读等文化传统入手予以阐释，但在南宋中后期的历史语境下，导致古文评点产生的最直接、关键的动因应当是科举考试的影响。评点中的“评”来源于考官阅卷后所附的批语；“点”则来源于考官评卷时的点抹符号。特别是后者，新发现的《绍兴重修贡举令》《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等史料展示了南宋考官在评阅试卷时使用点抹符号的具体情况，可以证明评点符号直接源自考官的阅卷形式。进而言之，正是在南宋中后期科举社会与商业出版的历史语境下，依附于古文选本的评点遂得以在当时的士人阶层间广泛流行。

**关键词** 古文选本；古文评点；点抹符号；科举社会；商业出版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commentary and punctuation on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guwen pingdian*) emerged as a new phenomenon alongside the popularity of antholog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prose in the mid to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cholars have often explored the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these commentaries by examining cultural traditions such as the punctu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annotation of classic texts. However,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mid to late Southern Song, the most direct and crucial factor behind the emergence of classical commentari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term “commentary” in this context derives from the remarks made by examiners after reviewing examination papers, while “punctua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interpunction marks used by examiners during the grading process. Notably, newly discovered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the “Revised Decree of Examination Regulations of Shaoxing” and the “Revised Rules of General Examination Formats of Shaoxing,” illustrate the specific use of marking symbols by examiners when assessing examination papers. Ultimately, it was precisely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uthern Song’s examination society and commercial publishing that commentaries and punctuations, closely linked to classical literary anthologies, gained widespread popularity among the scholar-official class of the time.

**Keywords** Antholog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Prose; Commentary and Punctuation on Classical Texts (*Guwen Pingdian*); Interpunction Marks; Imperial Examinations; Commercial Publishing

收稿日期：2024-03-31

作者简介：<sup>1</sup> 岑天翔，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大阪大学人文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研究方向为宋代文献与文学。

项目基金：本文系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课题“南宋士大夫の内面と詩に関する研究——郷里との結びつきに着目して”（编号：23KJ1429）阶段性成果。

## 一、引言

近年来，研究者们围绕古文评点产生与流行的问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已凝聚了一些共识，如兼具评语与点抹符号的评点形式产生于南宋中期，评点最初是伴随着古文选本而发展起来的，现存最早附有评点的古文选本是吕祖谦（1137—1181）编选的《古文关键》，等。

然而《古文关键》等古文选本是特定社会文化脉络下的产物，而其中所附评点的产生与此种历史语境存在怎样的关联，学界对此尚不清晰。换言之，古文评点产生以及流行的原因是需要进一步探寻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学界仍有一定的分歧。吴承学认为，“文学评点形式是在多种学术因素的作用之下形成的。这主要有古代的经学、训诂句读之学、诗文选本注本、诗话等形式的综合影响”，“评点的符号，则是在古代读书句读标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sup>1</sup>祝尚书则进一步提出，“始于北宋末的科举策论、经义的程式化，是南宋评点兴起的历史契机，而诗赋程式、‘江西诗派’诗文论则是评点家的参照模式和评论方法。”<sup>2</sup>前辈学者的研究都侧重于强调评点是在多种学术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将与评点存在联系的各种文化传统都纳入讨论范围，全面周延之余，却仍使人困惑：诸多因素中，究竟何者才是南宋中期评点产生的关键因素与直接动因？本文即拟结合新见史料，对此作出更深入细致的探讨。<sup>3</sup>

## 二、南宋古文选本中评语产生的补证

关于附刻评点的古文选本如何产生的问题，高津孝与林岩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高津孝着重强调了科举考试对于评点产生的作用，他指出，“评点是伴随南宋时代的古文选本——科举考试参考书——发展起来的”。<sup>4</sup>林岩针对此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南宋古文选本的大量出现以及采用圈点标抹、附加批语之评点方式的使用，明显受到了科举时文选本流行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南宋的古文之学之所以会以这样的形态出现，完全是‘科举社会’的一个产物”<sup>5</sup>。

林岩据以立论的材料是南宋姚勉（1216—1262）《雪坡集》所收殿试对策后附录的考官批语：

初考 议论本于学识，忧爱发于忠诚。洋洋万言，得奏对体。一上 臣经孙

覆考 以求士以文不若教士以道立说，一笔万言，水涌山出，尽扫拘拘谫谫之习。张、

程奥旨，晁、董伟对，贾、陆忠言，皆具此篇矣。一上 臣良贵

详定 规模正大，词气恳切。所答圣问八条，皆有议论，援据的确，义理精到，非讲明  
理学、该博传记者，未易到此。奇才也，宜备抡魁之选。臣熵 臣彬之 臣梦鼎<sup>6</sup>

<sup>1</sup> 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与南宋的诗文评点》，收入氏著：《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52—74页。

<sup>2</sup> 祝尚书：《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收入氏著：《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84—301页。

<sup>3</sup>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针对“评点最初是伴随古文选本而发展起来”的观点，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因此关于“评点如何产生”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化为“古文选本中的评语与点抹符号如何产生”的问题。本文也正是循着后者的思路展开讨论的。

<sup>4</sup> (日)高津孝：《宋元评点考》，收入氏著，潘世圣等译：《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2页。

<sup>5</sup> 林岩：《南宋科举、道学与古文之学：兼论南宋知识话语的分立与合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8页。

<sup>6</sup> 姚勉：《雪坡集》卷七《癸丑廷对》，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a—33b页。

此是姚勉殿试对策的试卷经“初考”“覆考”“详定”三次阅卷后，考官分别写下的批语。这些考官批语的内容、措辞，与今日所见南宋古文选本中的评语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林岩据此推论：“现存南宋古文选本的评语形式，有可能是效法了科场时文选本的批语方式，至少是有所借鉴”。<sup>1</sup>

古文选本中的评语是否源自科举考官？笔者拟在姚勉《雪坡集》材料的基础上，再补充一组相关的材料，即南宋时文选本《论学绳尺》中收录的考官批语。

《论学绳尺》一书由宋末魏天应选编、林子长笺解，收录南宋科场试论程文（试卷）一百五十六篇。<sup>2</sup>此书文首的批语多题为“批云”，存在出自编者之手的可能性，暂不讨论。但有少数文章的批语题为“考官批云”，显示源自当时的科场考官。如彭方迥《帝王要经大略》的文前批语为：“考官批云：说有根据，造辞老苍。较之他作，气象大段不同，真可为省闱多士之冕。”<sup>3</sup>缪烈《孝武号令文章如何》的批语为：“考官批云：议论正大，文势发越，可谓杰特之作。”<sup>4</sup>丘大发《三圣褒表功德》的批语为：“考官批云：议论高，行文熟，用事详赡，笔力过人。”<sup>5</sup>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君擢《唐虞三代纯懿如何》的文前批语云：“考官欧阳起鸣批云：文字出入东莱，议论法度严密，意味深长，说得圣人本心出，深得论体，可敬可服。”<sup>6</sup>这明确提示了此则批语的作者身份与姓名。欧阳起鸣，生卒年及行事皆不详，唯见《淳熙三山志》“嘉熙二年戊戌周坦榜”下有“欧阳起鸣，字以韶，闽县人”<sup>7</sup>，可知其人乃南宋嘉熙二年（1238）进士。<sup>8</sup>又刘克庄（1187-1269）为丁南一（字宋杰，1197-1266）撰写的墓志铭中曾提及，“别头考官欧阳起鸣，得宋杰赋击节，始擢第，然其年五十七矣”。<sup>9</sup>由此可知，欧阳起鸣曾于宝祐元年（1253）出任科举考官，<sup>10</sup>这与《论学绳尺》中所标注的来源正相吻合。

要言之，《论学绳尺》的编者在选录举子的试论程文时，将当时部分考官的批语一并收录，付梓刊刻。如果针对这些批语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其与南宋古文选本中评语的形式及内容颇为相似。除以上所列举数条外，另如批林执善《圣人备道全美》时提到“首尾相照应”“常山蛇之势”，<sup>11</sup>皆是古文选本中常见的评点术语，<sup>12</sup>这些都显示出宋代科举考官评阅试卷时的批语与古文选本中的评语之间的亲缘性。

<sup>1</sup> 林岩：《南宋科举、道学与古文之学：兼论南宋知识话语的分立与合流》，第19页。

<sup>2</sup> 《论学绳尺》现存版本当以明成化五年刊本为最早，见藏日本静嘉堂、内阁文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明成化五年刊本为底本，但多有删削改窜，原非善本，唯明刻本多为馆藏孤本，一时难以得见，故在不影响本文论述的情况下，暂时采用四库本。关于《论学绳尺》的成书、刊刻问题，参见慈波：《〈论学绳尺〉版本问题再探》，《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第94-102页。

<sup>3</sup> [宋]魏天应编选，[宋]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a页。

<sup>4</sup> 同上引，第35b页。

<sup>5</sup> 同上引，第12b页。

<sup>6</sup> 同上引，第1b页。

<sup>7</sup> [宋]梁克庄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明崇祯十一年[1638]刻本，第8127页下栏。

<sup>8</sup> 明代刊有《论范》，旧题“元进士欧阳起鸣撰”，《四库全书》据以收录，实则误宋人为元人。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546页。

<sup>9</sup> [宋]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六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389页。

<sup>10</sup> 所谓“别头考官”，是指主持别头试的考官，宋代规定若有亲属在本州任官等情况，为避免舞弊，举子须另行参加特别设置的回避考试，即为“别头试”。《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举人有亲戚仕本州，或为发解官，及侍父祖远官。距本州二千里，宜敕转运司选官类试，以十率之，取三人。’……故降是诏。自是诸路始有别头试。”参见[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21页。关于别头试的情况，另可参看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第6-18页；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3-156页。

<sup>11</sup> [宋]魏天应编选，[宋]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一，第15b页。

<sup>12</sup> 参见岑天翔：《南宋古文评点选本〈二十先生回澜文鉴〉考论》，《台北教育大学语文集刊》第40期（2021年12月），第103-140页。

虽然姚勉殿试对策与欧阳起鸣任考官，都已在晚宋理宗朝宝祐年间，距离吕祖谦编辑第一部古文选本《古文关键》已经过去八十年。<sup>1</sup>但这种考官在举子试卷后附上批语的行为，显然并非是到了理宗朝才产生的，而是有着较早的渊源。如北宋欧阳脩任考官时，曾在刘幾试卷上批有“秀才刺，试官刷”之语，即反映了考官附加批语的阅卷形式。<sup>2</sup>此外，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其上则具考官批凿，如所对善，则批一‘通’字；所对误及未审者，则批一‘不’字。”<sup>3</sup>由此可知，北宋时考官阅卷即有随文批语之惯例。北宋进士考试放榜后，前几名所撰的试卷很快便会流出，经商业书坊之手汇编成册，刊刻出版。<sup>4</sup>从吕夷简的例子来看，当时付梓流行的时文选本中很可能就附有考官的批语，以供举子们揣摩研习。尽管由于史料阙佚，其详细情况已难以探知，但应与南宋《论学绳尺》所收情况相差无多。

总之，这种考官阅卷时的批语，先是为时文选本收录刊印，而至南宋中后期，又为古文选本编辑者们所效仿，挪用至古文经典的评阅之中，直接影响了古文选本中评语的产生。

### 三、南宋古文选本中的点抹符号探源

古文选本的评点形式兼具“评”与“点”，即评语与点抹符号。<sup>5</sup>文章的品评起源甚早，而成熟的评点符号却是直至南宋才产生的新元素。故吴承学指出“评点之特色首在于‘点’，即点抹标志”，“这正是评点之所以与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主要形式特色”。<sup>6</sup>因此南宋古文选本中点抹符号的来源，亦是讨论评点起源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前述姚勉文集与《论学绳尺》的材料，足以回应古文评点中评语的来源，但有关点抹符号究竟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则仍需进一步讨论。正如林岩所言，“至于那些圈点标抹的标记符号是否也直接源于时文选本，则有待新证据的发现”。<sup>7</sup>

清代曾国藩（1811-1872）《〈经史百家简编〉序目》云：“梁世钟嵘、刘勰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试官评定甲乙，用朱墨旌别其旁，名曰圈点。后人不察，仿其法，以涂抹古书，大密点，狼藉行间。……圈点者，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sup>8</sup>曾国藩主张评点之学源自钟嵘、刘勰的诗文品评。此说发端于章学诚（1738-1801），章氏《校

<sup>1</sup> 吕祖谦《古文关键》的成书时间，依巩本栋的意见，定为乾道九年（1173）冬。参见巩本栋：《〈古文关键〉考论》，《文学遗产》2020年第5期，第48页。

<sup>2</sup> 事见[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8页。此条材料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提示，谨致谢忱。

<sup>3</sup>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76页。此条材料已见李由论文征引，参见氏著：《商业化运作与南宋古文评点的演变》，《文学遗产》2021年第4期，第83页。

<sup>4</sup> 如释文莹《湘山野录》载：“公岂不记作省元时，庸人竟摹新赋，叫于通衢，复更招呼云‘两文来买欧阳省元赋’”，何薳《春渚纪闻》亦曾提及“后刊新进士程文”云云。（见[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页；[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页。）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参见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附录《宋代科举考试与印刷业关系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58-285页；刘祥光：《印刷与考试：宋代考试用参考书初探》，《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7期（2000年5月），第59-63页；刘祥光：《宋代的时文刊本与考试文化》，《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5期（2011年11月），第43-47页。

<sup>5</sup> 需要说明的是，本节讨论的是文学评点意义上的点抹符号，而非一般行文句读意义上的句读符号。后者如岳氏《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言：“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亦但句读经文而已。”此处虽称“圈点”，但实则是书中附刻用以标示语意停顿或完结的“句读点”，岳氏认为这种形式源自建阳刻书，是效仿馆阁校点古书的格式。参见[元]岳浚：《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3页。

<sup>6</sup> 吴承学：《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收入氏著：《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第75-93页。

<sup>7</sup> 林岩：《南宋科举、道学与古文之学：兼论南宋知识话语的分立与合流》，第19页。

<sup>8</sup> [清]曾国藩编：《经史百家简编》卷首，光绪十七年（1891）求实斋丛书本，第1a页。

《雠通义》谓：“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sup>1</sup>但正如章氏所言，钟嵘、刘勰的诗文品评“有评无点”，与后世的评点之学显非一事，故不取其说。

但曾氏随后指出，圈点涂抹源自科场试官评定名次时施加的符号，且当时试官普遍采用朱笔、墨笔别异的形式；试官评卷的形式进而影响到时文评点，而最终被施之于古文评点。此说颇为新奇，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毕竟曾氏去南宋有数百年之久，南宋中后期古文选本中点抹符号产生的实际情况如何，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笔者最近在《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后所附《韵略条式》中发现了一则史料，对解释南宋时期评点符号的来源，以及阐明其与科举考试之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韵略条式》中收录一份绍兴五年九月八日颁布的关于贡举考试内容的敕命，后附有《绍兴重修贡举令》与《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两通，兹节录如下。

### 《绍兴重修贡举令》

诸春秋义题听于三《传》解经处出。

诸试卷犯不考者，具事因送封弥所。覆视同，即以元试卷及具乡贯姓名送考试院所，先次黜落，仍晓示。

诸考校试卷并分五等，逐等分上中下。

诸举人试卷犯点抹者，五点当一抹，五抹降为下。

### 《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

试卷犯不考：犯名讳 文理纰缪 诗赋不识题

.....

试卷犯点抹

抹：文理丛杂 文意重叠 误用字 脱三字 文意不与题相类 诗赋重叠用事 诗赋不对 诗赋属对偏枯 小赋四句以前不见题 赋压官韵无来处 赋全用古人一联语 赋第一句与第二句末用平声不协韵 赋侧韵第三句末用平声 赋初入韵用隔句对第二句无韵 赋少十字 论策经义连用本朝人文集十句 诗全用古人一句 诗叠用两句 诗用隔句对 论少二十字

点：错用一字 脱一字 误一字 赋少五字 论少十字 诗叠用一字<sup>2</sup>

这则材料是关于南宋科举考官阅卷方式的规定。根据上引史料可知，在南宋科举考试的阅卷阶段，规定将举子试卷中的纰漏错误分作“犯不考”与“犯点抹”二种。

“犯不考”有犯名讳、文理纰缪、诗赋不识题等，考官若在试卷中发现其中一例，便会直接将这名举子黜落。“犯点抹”则分“点”与“抹”二类，“点”有错用一字、脱一字、误一字等，“抹”有文

<sup>1</sup>[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校雠通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8页。

<sup>2</sup>[宋]佚名编：《韵略条式》，收入《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第17b-21a页。

理从杂、文意重叠、误用字、脱三字等。考官若在举子试卷中发现此类情况，便会以“点”“抹”的符号在试卷中予以标示，并且最后统计“点”“抹”符号的数量，据此将举子的试卷分为五等，逐等分作上、中、下。例如五个“点”相当于一“抹”，经统计后举子试卷中达到五个“抹”的话，则会将这名举子降为“下等”。由是可见，在南宋科举考试中，考官将施加“点”“抹”作为一种评阅试卷的方式。

关于宋代考官评阅试卷时使用点抹的情况，还可以从其他史籍中找到一些相互参证的材料。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中祥符八年三月癸卯”条载：“上御崇政殿覆试，多所黜落；又疑所点抹者或未当，命宰相阅视之。旦曰：考官过为艰难，公在其中矣。”<sup>1</sup>这里的“所点抹者”，即如《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所言，指考官在阅卷过程中将举子试卷中纰漏不当之处以点抹的形式予以标示。这是真宗朝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的记载，可见南宋科举考试施加“点”“抹”以评阅试卷的作法，其来有自。

另，《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二”条谓：“（绍熙三年）八月三日，礼部侍郎倪思言：太学解试，考官选自朝廷，无事关防。惟是外处考官，所差未必一一得人，其怠惰者厌文卷之多，其轻率者有忽略之意，至有漫取数卷应数，其余或不加点抹，或妄批一两字于卷首，而初未尝过目者。士子程文或不幸而遭之，虽是优长，不免黜落……乞下诸处试院，命考官精加考校，虽是落卷，必须批抹所以落之由。”<sup>2</sup>倪思（1147-1220）提及当时存在某些怠惰、不负责任的考官评阅试卷时“或不加点抹”，导致出现考试不公的现象，于是他乞请令考官精加考校，凡是黜落的试卷必须将黜落原因以点抹的形式予以标示。倪思所言虽是针对太学解试而言，但与上引《绍兴重修贡举令》《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中的规定相符，可引为参证，推想考官这种以点抹符号评阅试卷的方式，应是当时各级考试通行的规定。

关于这些“犯点抹”的性质，类似于现代考试中所谓的“扣分项”。检视《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所列“犯点抹”的情况，其中有单纯针对形式纰漏的，如“错用一字”“脱一字”“误一字”等；亦有涉及文意、文理及写作技巧优劣的，如“文理从杂”“文意重叠”“文意不与题相类”“诗赋属对偏枯”等。由后者可以看出，考官在利用“点”“抹”评阅试卷时，已经涉及到针对立意说理、作文技巧的优劣判定。

本文认为这种考官阅卷时使用“点”“抹”符号进行评判的行为，无论是形式还是意涵，都与南宋古文选本使用点抹符号评阅古文作品有着相似之处，很可能就是后者的直接起源。

不过尚待解决的问题是：点抹符号在考官评阅试卷时主要是从负面即扣分角度用以标示文章劣处，而在古文选本中则是从正面用以标示文意转换、语句精彩处，这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尽管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有限，但仍不揣浅陋，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者，从原理而言，考官利用点抹符号所标示的尽管是文章劣处、不当处，但这些被标示的部位，其实是一篇试卷中考官会特别关注、留意的部分，如赋的前四句、论的“冒子”等。<sup>3</sup>场屋试卷中的这

<sup>1</sup>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20页。

<sup>2</sup>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二”条，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600页下栏-第4601页上栏。

<sup>3</sup> 参见祝尚书：《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收入氏著：《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第210-232页。

些部位既是举子容易犯错、扣分的部分，同时也可以说是举子有机会吸引考官青睐，在同场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部分，亦即所谓的紧要关键处。故而到了古文选本编辑者手上，在古文经典上施加相同的点抹符号以标示正确的范例，以供举子揣摩研习，亦当是情理之中。事实上，二者关注的重心颇有对应之处，如考官以抹标示“文意不与题相类”处，至古文选本则常以长抹标示主意纲目；考官以抹标示“文意重叠”，古文选本则常以短抹标示文意转换；考官以点标示“错用一字”，古文选本同样以点标示用字佳处。要言之，古文选本编辑者出于揣摩考官之意，将原本用于标示扣分项的点抹符号，反用于标示古文经典之佳处，作为范例提供举子研习。

二者，从具体人物而言，兼具科举考官与古文选本编辑者身份的吕祖谦，可能在此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sup>1</sup>据《年谱》，吕祖谦曾于乾道八年（1172）春任省试考官，<sup>2</sup>必定熟知阅卷时点抹符号的使用方法及规则，且有亲自评阅举子试卷的经历。而后吕氏因丁父忧，退居婺州，于明招山授徒讲学，翌年乾道九年（1173）即编就《古文关键》一书，是为古文选本中附加点抹符号之始。吕祖谦很可能将考官以点抹符号评阅试卷的方式带入举业教授之中，用以评阅学生们的时文作品，而又欲为学生提供正确的范例，则择选时文、古文作品并施加点抹符号于上，<sup>3</sup>于是乃有附加评点的《古文关键》一书的问世。况且吕祖谦教人作文主张“识人文字长处，复识短处”，<sup>4</sup>这其中便蕴含了借鉴他人作文长处、规避他人作文短处的阅读思想，因此在他手上点抹符号经历了一个“反用”的转换过程，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南宋考官评阅试卷时所使用的点抹符号，是古文选本中点抹符号的直接来源。兼具科举考官与古文选本编辑者身份的吕祖谦，因举业教授的契机，以“反用”的方式将点抹符号引入古文经典的评阅之中，最终于乾道九年（1173）冬编成被称作为“评点第一书”的《古文关键》。

南宋古文选本中点抹符号的形态及使用方式，还遗存有颇多来自考官阅卷方式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三方面。一者，早期皆用点抹而不用圈。高津孝在对比《古文关键》诸种宋刻本的圈、点、抹等符号的情况后，提出南宋评点符号产生的次序是先有点抹，之后才再增加了圈。<sup>5</sup>《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苏评孟子》提要谓：“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评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谢枋得《文章轨范》、方回《瀛奎律髓》、罗椅《放翁诗选》始稍稍具圈点，是盛于南宋末矣。”<sup>6</sup>同样是主张先有抹、后有圈点的发展次序。由此可见，早期古文选本中的符号形态为点抹而非圈，这或许正是考官阅卷时点抹符号使用规定所遗存下来的影响。

二者，重视文章的立意、说理。吕祖谦《古文关键》篇首《总论看文字法》第一条便是“看大概

<sup>1</sup> 这一点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提示，谨致谢忱。此外，李由也曾论及吕祖谦的举业教授与古文评点之间的关系，参见李由：《商业化运作与南宋古文评点的演变》，《中国文学研究文摘》2022年总第2辑，第84页。

<sup>2</sup> [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686页。

<sup>3</sup> 吕祖谦曾在与朱熹的书信中提及：“拣择时文、杂文之类，向者特为举子辈课试计耳，如去冬再择四十篇。”（见[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集》别集卷八《与朱侍讲书》，第384页）此处的“杂文”即指古文作品，“去冬”则是乾道九年冬。

<sup>4</sup> [宋]吕祖谦：《增续历代奏议丽泽集文》附录《古文关键·总论看文字及作文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06页。

<sup>5</sup> （日）高津孝著，潘世圣等译：《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sup>6</sup>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第307页。

主张”，<sup>1</sup>书中的批语多次出现“主意”“大意”等字眼，书中的抹亦大多用以标示主意纲目与文意转换处，这些都体现出《古文关键》重视文章立意的论文倾向。这固然与吕祖谦个人的文学思想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南宋考官评阅试卷时最为重视文章立意、说理处，并以点抹符号标示扣分项，就这一点而言《古文关键》中点抹符号展现的批评取向，或许也有受到考官评阅试卷方式的影响。

三者，朱墨并用的形式。《宋会要辑稿》“选举三”条载：“宝元二年十一月四日，翰林学士丁度等言：准诏详定侍读学士李淑言：昨充殿试详定官，切见初考用朱，覆考用墨，等第下计点抹数误书等第，众官参详，小有差错，只令用印。”<sup>2</sup>这里的“计点抹数”，即阅卷后统计“犯点抹”的数量，并依此评定等第。值得注意的是，由这则材料可知，宋代考官评阅试卷时，为了区分初考与覆考，在试卷中分别以朱笔、墨笔进行点抹标示。也就是说，一份经过考官评阅后的试卷，应同时具有朱笔、墨笔的点抹符号。

后世的评点文本亦有朱墨并用的形式。《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记录了黄榦（1152–1221）针对《四书》的点抹符号，其中有“红中抹”“红旁抹”“红点”“黑抹”“黑点”等。<sup>3</sup>同书卷二“批点韩文凡例”自称为“广叠山法”，谓其得自宋末谢枋得的评点之法，其中也提到以黑、红、黄、青四色笔，施加截、侧抹、中抹、侧圈、侧点等批点符号。<sup>4</sup>这种以不同颜色分别圈点的形式，在后世更是影响深远，最为人所知的是归有光（1507–1571）、方苞（1668–1749）等以“五色圈点”评点《史记》。以往学者常举《魏略》所载董遇“朱墨别异”的读书方法，作为后世“五色圈点”的滥觞。<sup>5</sup>但必须指出的是，《魏略》同时记载：“由是诸生少从遇学，无传其朱墨者。”<sup>6</sup>即是说，在董遇去世后，他所谓“朱墨别异”的读书法便失传了。三国时期董遇的读书方法，是否对近千年以后的宋人评点产生影响，是存在疑义的。而反观宋代科举考试中，考官以朱笔、墨笔点抹标示试卷的形式，却是真实存在，时人以朱墨并用的形式评点文本更可能是受此影响。

## 四、科举社会、商业出版与古文评点的流行

在探明古文评点的起源问题后，笔者拟进一步讨论依附于古文选本的评点是如何在南宋中后期社会间广泛流行的这一问题。

### （一）科举社会

古文评点中的评语与点抹符号，源自科举考官评阅试卷的形式，显示出古文评点与科举考试之间的亲缘性。而古文评点之所以在士人群体间广泛流行，深受欢迎，个中原因亦与科举社会的语境密切相关。

<sup>1</sup> [宋]吕祖谦：《古文关键》卷首《看古文要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页。

<sup>2</sup>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条，第4271页下栏。

<sup>3</sup> [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5–26页。

<sup>4</sup> 同上引，第31–34页。

<sup>5</sup> 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与南宋的诗文评点》，收入氏著：《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52–74页。

<sup>6</sup>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0页。

一方面，科举社会的成立与士人阶层的扩大，使得附有评点的古文选本拥有了庞大的受众。根据宋代科举取士制度，理论上举子只要进士及第即可释褐任官，这对时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晚宋人余炳所言：“诏书一下，四海鼓舞；上登科甲，九族光彩。人知其足喜也。”<sup>1</sup>反之，则如黄公度所言：“士非以科第进者，同时辈往往嗤鄙之。”<sup>2</sup>科举考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读书—科举—出仕”的生活模式。同时结合学校兴立等因素，使得社会间形成了庞大的读书人群体。根据贾志扬(John W. Chaffee)的统计，十一世纪单科的科举考生人数在二至三万人左右，至十二世纪初，考生人数已接近八万人，而到十三世纪中叶的南宋后期，人数已经达到四十万人以上。<sup>3</sup>这些读书人群体是古文选本潜在的受众，他们对于文化教育、作文训练的实际需求，使得选录经典、附刻评点的古文选本在社会间受不断编纂、刻印及流通。

另一方面，随着科举考试竞争的激烈化，研习包括古文选本在内的科举参考书成为举子场屋竞胜的重要手段。随着应试人数的不断增加，南宋后期的士人面临着强大的科举竞争的压力，《宋史·选举志》载光宗绍熙时，“寒士于乡举千百取一之中，得预秋荐”。<sup>4</sup>如何超越同辈、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成为当时士子普遍关心、思考的话题。举子们逐渐探寻得一种专门应对科举考试的学问路径，时人称之为“科举学”或“科举之学”，研读科举参考书乃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在“以古文为时文”的观念影响下，南宋举子普遍希望从古文经典中学习时文的写作技巧，从而纠偏转相因袭、冗弱软腐之弊，以利场屋竞胜。<sup>5</sup>正如刘震孙在《文章正印》书前序言中所言：“因批以求意之相关，因点以观文字之造妙，则胸中洞融，笔下滂霈，擢棘闱、冠兰省、魁枫陛，累累之印垂金，腰间之印如斗，皆自此正印中来矣。”<sup>6</sup>古文评点可以帮助举子迅速且精准地领会文章主旨及语言精妙处，进而提升自身应试作文的技巧，最终在科举考试中拔得高第，这促使其在南宋中后期的士人群体间深受欢迎，以致广泛流行。

## (二) 商业出版

南宋中后期古文评点的流行，还不应忽略另一个社会文化因素，即是南宋中后期商业出版文化的发达。目前所见南宋中后期的古文评点选本，基本都是由福建建阳地区的商业书坊刊刻出版。这其间固然存在文献流传、阙佚的因素，但也确切地说明了南宋中后期古文选本与建阳地区商业出版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一方面，商业书坊采取的生产与销售模式，加快了附刻评点的古文选本的出版及流通效率。建阳地区的商业书坊通过革新书籍刻印生产的模式，如使用本地出产的竹纸等原料、采取小开本及狭行密

<sup>1</sup>[宋]余炳：《贡士庄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九二六，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3册，第214—215页。

<sup>2</sup>[宋]黄公度：《知稼翁集》卷下《送郑少齐赴官严州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a页。

<sup>3</sup>(美)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56页。何忠礼推算的南宋中后期举子人数则要更多。何氏以“解额三千人，二百人解一人”的思路，推断南宋中后期一科的应举士人可能达六十万人。参见何忠礼：《南宋科举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5页。

<sup>4</sup>[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五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39页。

<sup>5</sup>参见祝尚书：《宋元文章学的基础：时文以古文为法》，收入氏著：《宋元文章学》，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1—78页。

<sup>6</sup>[宋]刘震孙编：《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卷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咸淳九年(1273)刻本，第3a—3b页。

字的版式、降低书籍校勘品质、增加书籍的印刷次数等，有效地降低了书籍的刊印成本与销售价格。<sup>1</sup>低廉的价格使得古文选本拥有了在广大中下层士人群体间流通的可能性。同时，商业书坊追求“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通过不断增加书籍刊印的种类与数量，缩短销售周期，以谋求商业利润。如南宋岳珂言：“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sup>2</sup>正是在这种“日辑月刊”的刻印模式与“速售”的经营模式下，古文选本的流通效率得到极大地提高，士人获得古文选本的难度也极大地降低，最终达到“四方转致传习”、社会间广泛流通的局面。

另一方面，商业书坊设计的书籍形式与内容，吸引兜揽古文评点选本的购买者。如建阳商业出版的古文评点选本往往附有牌记，宣传本书内容丰富、校勘精良、助益科举等，起到了广告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读者购买。《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目录前即附刻一跨六行、四周双边的牌记，文曰：“二先生文，精练雄伟，工文家所快睹。是编又出名公选校，一是粹作，篇加圈点，辞意明粲。本斋得之，不欲私阅，绣梓公传，与天下学者共读，伏幸精鉴。”<sup>3</sup>这则牌记一方面强调陈亮、叶适文章的精练雄伟，有助于作文，另一方面宣传此书出自“名公选校”，积极利用选家的名人效应，吸引读者。特别是牌记中宣传附有“圈点”，强调这类评点符号有助于文章辞意的理解，足以引起潜在读者的购买兴趣。此外，书坊设计了“类编”“增注”“诸儒批点”“标题”等体例，丰富多样，满足了读者的差异化需求，而且颇具实用性、功利性，对于那些为功名而读的广大的中下层士人而言，无疑极具吸引力。同时，商业书坊紧跟科举考试的命题风尚，因应场屋的最新动向而调整古文选本的内容，例如在宋末理学逐渐成为科举出题标准之际，商业书坊出版的古文选本中便选入大量的理学家作品，这导致古文选本被不断地重编、更新，也使得读者始终需要购买最新的版本。

要言之，南宋中后期的科举社会决定了附加评点的古文选本的庞大市场需求，商业书坊又创新出版及销售模式，加快了书籍生产与流通效率，使得时人获得古文选本类书籍的难度降低。正是在科举社会与商业出版的历史语境下，附刻评点的古文选本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流通、阅读，在南宋中后期的社会间风靡一时。

## 五、小结

南宋中后期古文评点产生及流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古文评点的产生固然有经学章句、读书句读等诸多文化传统的影响，但究其关键因素与直接动因乃是科举考试。评点中的“评”源自科举考官评阅试卷时所附的批语，其先为时文选本收录刊印，而后又为古文选本编辑者们所效仿，挪用至古文经典的评阅之中。“点”则源自科举考官评阅试卷时所使用的点抹符号，利用新见《绍兴重修贡令》《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等史料，可以复原南宋考官在评阅试卷时使用点抹符号的具体情况，

<sup>1</sup> 如吕祖谦在与朱熹的一封信中提到：“婺本例价高，盖纸籍之费重，非贫士所宜，势必不能夺建本之售。”（[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别集卷七《与朱侍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7页）可见建刻本由于纸张的选用，成功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显示当时建刻本售价十分低廉，甚至连贫士都可以买得起。另可参考（美）贾晋珠著，邱葵、邹秀英、柳颖、刘倩译：《谋利而印：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2–81页。

<sup>2</sup> [宋]岳珂：《愧郯录》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3页。

<sup>3</sup> [宋]旧题饶辉编：《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卷首，台北国图馆藏宋刻本，第3a页。

证成评点符号直接来源于考官的阅卷形式。兼具科举考官与古文选本编辑者身份的吕祖谦，因举业教授的契机，将原本从负面即扣分角度用以标示文章劣处的点抹符号，反用于古文经典之上从正面角度标示文意转换、语句精彩处，最终纂成《古文关键》一书，是为评点之始。此后，在南宋中后期科举社会与商业出版的历史语境下，依附于古文选本的评点得以在当时的士人阶层间广泛流行，对中国近世的文学及社会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Chaffee J. W. (1985).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中译本：贾志扬。(1995). 宋代科举. 东大图书公司.)
- Chia L. (2002).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贾晋珠.(2019). 谋利而印：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岑天翔. (2021). 南宋古文评点选本《二十先生回澜文鉴》考论. 台北教育大学语文集刊, (2), 103–140.
- 曾枣庄,刘琳. (2006). 全宋文(第343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 慈波. (2015). 《论学绳尺》版本问题再探. 文学遗产, (4), 94–102.
- 巩本栋. (2020). 《古文关键》考论. 文学遗产, (5), 44–53.
- 高津孝. (2013). 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何忠礼. (2009). 南宋科举制度史. 人民出版社.
- 李由. (2021). 商业化运作与南宋古文评点的演变. 文学遗产, (4), 81–94.
- 林岩. (2006). 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林岩. (2013). 南宋科举、道学与古文之学：兼论南宋知识话语的分立与合流.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6), 12–24. <https://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3.06.003>
- 刘祥光. (2000). 印刷与考试：宋代考试用参考书初探. 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1), 59–63. [https://doi.org/10.30383/TJH.200005\\_\(17\).0002](https://doi.org/10.30383/TJH.200005_(17).0002)
- 刘祥光. (2011). 宋代的时文刊本与考试文化. 台大文史哲学报, (2), 43–47. <https://doi.org/10.6258/bcla.2011.75.02>
- 梁庚尧. (2015). 宋代科举社会.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https://doi.org/10.6327/NTUPRS-9789863501275>
- 吴承学. (2020). 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 广东教育出版社.
- 祝尚书. (2006). 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 大象出版社.
- 祝尚书. (2008). 宋代科举与文学. 中华书局.
- 祝尚书. (2013). 宋元文章学. 中华书局.